

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系主編

177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

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初版.--臺北市：文史哲，民 80

面； 公分

ISBN 957-547-076-1 (精裝).--ISBN 957-547-077 X (平裝)

1.中國文學-漢(西元前 202-西元 220)-論文，講詞等 2.哲學-中國-漢(西元前202-西元220)-論文，講詞等

112.2

80003715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初版

精裝定價新臺幣六〇〇元
平裝定價新臺幣五〇〇元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主編者：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076-1 (精裝)
ISBN 957-547-077-X (平裝)

¥240.-

序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光輝的時代，開疆拓土，國勢鼎盛，中國人每以大漢天威自豪。然而，漢代對後世中國影響最大的不是顯赫的武功和強盛的國勢，而是輝煌的文學成就和耀眼的思想光芒，因此，對漢代的研究應該以文學和思想爲兩大主軸。

臺灣地區自光復以來，文學界、史學界、哲學界對漢代研究似乎都未曾給予應有的重視，以致漢代研究的成果不及先秦、唐宋等時代豐富，造成中國人（尤其是臺灣地區的中國人）對漢代研究仍停留在空浮式、遠觀式的境地，這是值得大家警惕的事。

爲了提倡漢代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文理學院乃於本（七十九）年六月二日至三日假政大藝文中心舉辦「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希望通過對文學和思想兩個主軸的討論來提升國內學術界對漢代研究的興趣。兩天的會期，共提出了二十六篇論文，經過熱烈的討論，讓我們深深感到我們的願望並沒有落空，而且證明了國內學者對漢代研究具有雄厚的潛力。

這次「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的舉行，原由政大中文系所倡議，得到歷史系和哲學系的支持，共同策劃推動，會議的實際行政工作則全由中文系負責，我特別要感謝中文系主任簡宗梧教授，

由於簡主任的思慮縝密，使研討會一切進行順利；我最要感謝的是中文系的張雙英教授，張教授擔任這次研討會籌備會總幹事，認真負責，處理事務條理分明，張教授應是這次研討會功勞最大的人。此外，中文系陳全得助教主動積極的辦事精神，也是這次研討會的大功臣，我願在此一併致謝。

當然，學術性研討會的成敗主要關鍵繫於論文報告人和參與討論者的態度，我要感謝二十六篇論文的作者和二十六位特約討論以及一百多位與會者，如果沒有精彩的論文和熱烈的討論，研討會是註定要失敗的。二十六篇論文出自國內各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教授之手，而應邀與會者均是各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研究漢代文學、經學、史學、哲學的知名學者，由於出席者水準高，所以達成了這次研討會的目的。

我要感謝政大校長張京育博士的大功支持，教育部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經費補助，才能使這次研討會順利舉行。我也要感謝文史哲出版社慨允出版這次研討會的論文集，使這次研討會的成果得以呈現給世人，不致因時間的流逝而消失。

王壽南 謹識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國立政治大學文理學院

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目次

序	王壽南	一
從專業賦家的興衰看漢賦特性與演化	簡宗梧	一
論《韓詩外傳》	龔鵬程	三五
《白虎通德論》之思想體系及其倫理價值觀	張永傳	七一
漢代宇宙論之興起與發展及其在哲學上的意義	鄺昆如	八九
董仲舒的正義觀及其思想梗概	曾春海	一一五
孔雀東南飛試析	王文顏	一四三
兩漢鏡銘所見吉語研究	林素清	一六一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與司馬遷的「天道觀」之比較研究	梁榮茂	一八九
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	顏崑陽	二〇九

兩漢章句之學重探·····	林慶彰·····	二五五
從黨錮、獨行諸傳看漢代儒術流變·····	姚秀彥·····	二七九
試論漢代的古史系統·····	王仲孚·····	三〇五
漢賦興起的歷史意義·····	謝大寧·····	三二三
諸子考釋讀後·····	喬衍琯·····	三四一
漢代玉衣的始末·····	章成崧·····	二六三
尊王黜霸主張在漢初的發展與意義·····	黃湘陽·····	三八七
從董仲舒、淮南子至王充的「天」與「命」·····	項退結·····	四一三
漢墓出土黃帝四經所論道法關係初探·····	沈清松·····	四三五
詩經毛傳婚期以秋冬爲正時說之商榷·····	朱守亮·····	四五五
漢樂府的雙璧——〈羽林郎〉與〈陌上桑〉比較評析·····	沈 謙·····	四七一
陸賈思想的研究·····	楊樹藩·····	五〇五
王充的科學思想·····	韓復智·····	五一九
誰道君王薄賈生——試從思想角度探討賈誼與漢文帝之關係·····	孫鐵剛·····	五五一
王著〈漢代的古史系統〉讀記·····	黃彰健·····	五七一
從說文讀若中考東漢聲類·····	謝雲飛·····	五七七

從專業賦家的興衰看漢賦特性與演化

簡宗梧

一 前言

什麼人唱什麼歌，什麼樣的文人就寫什麼樣的篇章，所以有關文學作品的研究，常從作者入手。如果背景相同的作者羣，同爲某些讀者而創作，那麼他們的作品，將呈現某些共同的特性，這是可以預期的。所以，某些作品何以呈現共同特性，從作者羣的共同背景，常不難考察其原因。

漢賦被稱爲貴遊文學，昌盛於宮廷，是一種相當特殊的宮廷文學。御用的專業賦家，被稱之爲言語侍從，他們的職分，就是「朝夕論思，日月獻納」，這是班固《兩都賦序》所明言的。這些言語侍從之臣的背景是什麼？他們的前身是什麼？我們若加以探討，便不難了解他們的出身、學養與地位，從而探究他們的作品所呈現的共同特性，乃其來有自。甚至從其地位的起落，去探討漢賦特性變化的原因，似乎都可以得到相當合理的解釋。所以從專業賦家的興衰，去觀察漢賦，去推知漢賦，應不失爲一個可取的角度與有效的途徑。

本文即嘗試循此途徑，做一個新的開拓，以期對漢賦這大國^①做不同的探索與認知，使漢賦的各從專業賦家的興衰看漢賦特性與演化

種特質與現象，能得到更合理的詮釋，並使漢賦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得到更具體的肯定。當然，這種嘗試與詮釋，應是前所未有的，草創發端，不免思慮欠周，尚祈方家，有以教之。

二 專業賦家地位之起落與漢賦之盛衰

在中國古代的社會，能文之士除了得寵入仕之外，只有寄食於列侯或帝王，充當侯門清客文學侍從。早期漢賦，依附貴遊而興，因列侯帝王獎倡而盛。漢賦的盛衰與言語侍從之臣的地位起落，有密切的關係。

1. 梁王菟園爲宮廷專業賦家之搖籃

梁孝王武，是漢文帝的次子，與景帝同爲竇太后所生，乃深受寵愛。又因平七國之亂有功，所以「居天下膏腴之地」，「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②，而這些游說之士，長於辭令，有行人應對之才。在戰國時代，則爲縱橫家，當其太平無事，長才不得施展，只好淪爲言語侍從，成爲漢代貴遊文學的先驅，而梁王的菟園，也就成爲日後宮廷專業賦家的搖籃了。

在《史記·梁孝王世家》提到的游說之士，有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依《西京雜記》所

載，羊勝作《屏風賦》，公孫詭作《文鹿賦》，鄒陽作《酒賦》、《几賦》，另外還有枚乘作《柳賦》，路喬如作《鶴賦》，公孫乘作《月賦》，都是在「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③的情況下寫作的。當然這些遊士，未必都是言語侍從，如《史記》就說公孫詭多奇邪計，官至中尉，號稱公孫將軍，還與羊勝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④，看來就不是言語侍從而已。不過，游說之士與言語侍從，原本就難分軒輊，《文心雕龍·時序》便說辭賦「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他們在梁王聽政餘暇，於忘憂館作賦取樂，罰酒賜帛，不免崇尚辭賦之道，於是梁王菟園就成爲培養賦家之搖籃了。

梁王菟園的賦家不止這些，西漢第一大賦家——司馬相如，也出身於梁王賓客，他的《子虛賦》和《美人賦》應作於他遊梁之時⑤。另外，在《漢書·藝文志》列有賦二十四篇的嚴忌，也是梁王的上客⑥，他的兒子嚴助後來也就成爲武帝的言語侍從，並立有事功⑦，足見梁王菟園孕育賦家之功。當然，在漢初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並不是始於梁王，也不限於菟園。正如《漢書·地理志》下所說：

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

但吳王濞因其子被殺，稱疾不朝，圖謀作亂。枚乘、鄒陽、嚴忌諫言不被採納，隨即赴梁，都爲梁王

所吸收^⑧。這些娛游子弟的大匯集，才成為漢一代文學主流的發皇。至於淮南王劉安，雖也有賦八十二篇，其羣臣有賦四十四篇^⑨，但這些賦作是不是早於武帝招致言語侍從之時，則不無疑問^⑩。再說，他們與後來宮廷專業賦家，缺乏直接的淵源，所以論漢室專業賦家的搖籃，也就非梁王菀園莫屬了。

2. 西漢言語侍從鵲起與辭賦鼎盛於宮廷

梁王武薨於景帝中元六年（西元前一四四年）^⑪，娛游子弟頓失了依恃，辭賦失去了良好的發展環境。言語侍從流離失散，他們不能再在一起切磋，或相互激盪。所幸，漢武帝適時收納了這些漸成專業的賦家，給予更優裕的發展空間，提供更豐富的諷詠題材。

《漢書·枚乘傳》說：「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可見武帝徵求能文之士，是如何的殷切。這位撰《七發》、《柳賦》、《梁王菀園賦》的枚乘^⑫，沒有接受武帝恩寵的福分，可是他的庶子就成了武帝的言語侍從，「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而留下可讀的賦一百二十篇，而尤嫚戲不可讀的賦數十篇^⑬。司馬相如則借狗監楊得意獻《子虛賦》，獲得武帝的召見，並再獻《天子游獵賦》，而為言語侍從，後來還拜中郎將，建節往使通西南夷。但他還是安於言語侍從之位，「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⑭。依《漢書·藝文志》記載，他死後留下賦二十九篇。嚴忌的兒子嚴助^⑮，也獲得

武帝的擢拔，而爲中大夫，在其左右，常「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乃獲親幸。曾使南越，拜爲會稽太守，與淮南王安交私論議，可見他有縱橫家的本質。後來淮南王反，受到株連，武帝欲寬貸其罪，但廷尉張湯以爲他「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⑮，而予以棄市。從所謂「出入禁門，腹心之臣」，就可知其受寵的程度了。

除了梁王菟園出身的司馬相如，及菟園賓客的下一代——枚皋和嚴助之外，武帝還網羅了其他的能文之士。嚴助推薦朱買臣，在召見時「說書秋，言楚詞」，於是爲武帝所悅，拜爲中大夫。後來擔任會稽太守及主爵都尉^⑯，《漢書·藝文志》記其賦三篇。另外，還有吾丘壽王、東方朔、嚴葱奇，都是隨侍武帝左右的言語侍從^⑰。《漢書·藝文志》列吾丘壽王賦十五篇，嚴葱奇賦十一篇。至於東方朔有《七諫》、《答客難》，都是辭賦之作。

《漢書·東方朔傳》說：「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閑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可見當時能文之才士濟濟^⑱。當然我們不能將這些能文之士，一律歸之爲言語侍從。因爲武帝好賦而自己也曾作賦^⑲，風氣所及，那些公卿大臣及儒生也不乏能文善賦者。正如班固《兩都賦序》所謂：「言語侍從之臣」固然「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依據《漢書·藝文志》著錄，倪寬賦二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司馬遷賦八篇，蕭望之賦四篇。至於董仲舒，《漢書·藝文志》雖然沒有著錄其賦作，卻在《藝文類聚》可以看到他的《士不遇賦》。

從這些公卿大臣都汲汲於作賦，就可知道當時宮廷辭賦之盛了。從司馬相如「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安於言語侍從之職，以及嚴助等言語侍從大多有事功，在皇帝左右備受優遇，出任官職，職位不低，就可以知道當時言語侍從地位之高了。

武帝之後，昭、宣、元、成，大體承此遺風，因此辭賦歷久不衰，尤其宣帝令王褒「與張子僞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②，完全是貴遊作風。當時待詔金馬門，還有劉向、華龍、柳褒等人，當「太子體不安，若忽忽善忘，不樂」，還「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復，乃歸。」簡直以辭賦奇文爲藥石，太子確也「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③這位太子就是後來的元帝，其位雅好辭賦，自在意料之中。

成帝也是辭賦的雅好者，從《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爾後揚雄有《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諸賦之作，便知此時言語侍從乃爲朝廷所必需，爲帝王所雅好，但貴遊的成分轉淡，歌頌盛德，稱述盛事，以備揚於後世的意味趨濃。賦既非帝王所熱心投入，對言語侍從不再恩寵有加，所以揚雄便有「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的感慨，造成「輟不復爲」的

反應²³。

辭賦自武帝以來，既被如此獎倡，言語侍從得以侍帝之左右，於是風起雲湧，鼎盛於朝廷。班固《兩都賦序》說：「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漢書·藝文志》列「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扣去「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以及「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等不是漢人的作品，西漢賦家凡七十三家，作品九百四十篇，其他未被著錄者，更不知凡幾。西漢就在帝王的獎倡下，言語侍從大展長才，給予辭賦廣大的發展空間，也提供強烈的創作動機，辭賦之盛於朝廷，乃其來有自。

3. 東漢言語侍從沒落與辭賦普及於朝野

言語侍從到東漢就沒落了，因為帝室侯門對文學的興趣，已產生改變。王莽藉讖緯而篡漢²⁴，光武亦據之而中興²⁵，光武因此特重讖緯，一時公卿大夫莫不善於圖讖。非議圖讖，竟斥為非聖非法，怒令處斬²⁶。明帝、章帝也祖述圖緯，於是儒者爭學，兼復附以妖言²⁷。那些著名的侯王自能詩賦者，也沒有招致言語侍從以遊戲筆墨為能事²⁸。章帝以後，都是母后臨朝，幼主即位，權歸女主，這些女主無不「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²⁹，都沒有言語侍從專業賦家的生存空間。所以《後漢書》雖立有文苑傳，卻很難找到一個是充任言語侍從的專業賦家。雖然在靈帝時，有樂松、賈護之徒，招集淺陋的文人待制於鴻都門下³⁰，略具言語侍從的規模，「但真正有名望的作家

卻因世亂而散居各地。其時算得上結納文士的，先是荊州的劉表，然後於鄴下的曹操父子們。劉表以虛譽得官，頗爲一些文人所歸附，但到了曹氏父子得勢，而有名望的作家們又被網羅到鄴下去了。」^{③①}依曹丕的記述，他們「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③②}，又見當年梁孝王於梁園、漢宣帝遊幸宮館的貴遊作風，但時屆東漢末葉，辭賦在言語侍從長久的沒落之後，已經產生質變與量變。

「東漢以下雖沒有職業的貴遊文學家，而貴遊文學的作風不但沿襲未改而且擴大普及了。」這是王夢鷗先生所強調的，他還說：「當時名人如班固、傅毅、崔駰、張衡之倫，都是雅擅辭賦的；尤其可觀的是在民間以文學傳授者，幾乎無遠弗屆，而且他們的徒衆，動輒以百千數。」因爲：

《後漢書》別立《文苑傳》，其中被劉勰說到，僅有杜篤、傅毅二人，其餘或自有傳，或則僅見於此者，所為詩賦，數目不少。此外被列入《儒林傳》的，如衛宏、趙壹、張升、王延壽、邊讓、鄼炎、張超、侯瑾等人，也都有賦頌之類作品。尤其是這夥儒林人物，他們所擁的門徒多至萬人者有張興、牟長、蔡玄、樓望；三千人以上者有張超、曹曾、朱登、魏應；其餘，數百至千餘人者，更是隨在可見。這些教師能名見史傳，當屬衆中佼佼者，等而下之，不見史傳的人師當然更多。儘管他們教學的內容以經術為重，但寫作辭賦亦自是必修的課程。^{③③}

由於辭賦擅場於儒家定於一尊的武帝之世，言語侍從得意於漢帝國鼎盛之時，於是專業賦家依附儒家以求發展，儒者亦運用辭賦以曲達其旨^{③④}，以致辭賦已非言語侍從之專能。在言語侍從失勢之

時，辭賦並不因此而銷聲匿跡。這種「暇豫事君」的文學^⑤，到了不能「暇豫事君」的時候，仍有其自娛娛人的功能，所以仍有廣大的愛好者。職是之故，在東漢已缺乏言語侍從之臣的生存空間，辭賦仍有大肆發展的餘地。只可惜《後漢書》沒有藝文志，我們不能據以了解東漢辭賦的盛況，但王夢鷗先生的引證，已足以見其端倪。其實以今可考見的賦家賦作，亦可見其一斑。

何沛雄依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列《現存漢魏六朝賦作者及篇目》，西漢得二十家四十九篇，東漢則有五十家一百九十篇^⑥。曹淑娟《兩漢辭賦總目》，則列西漢二十四家七十九篇（含佚名四篇），東漢四十三家一百二十九篇^⑦。由於二家對賦的界定不同，所以數量不一，曹氏包括七類與騷類，何氏除《七發》外，七類全被排除，所以西漢部分，何氏少於曹氏所計。可是曹氏總目不含括名列《三國志》的建安七子及楊修、張紘、潘勖、繁欽、丁儀、丁廙、崔琰等人，因此所列東漢賦家及作品就少於何氏。其實，建安七子及楊修等，皆死於東漢建安年間，都該列入東漢。其他，如曹操父子三人八十五篇，何、曹二氏皆未計入，他們的賦大多作於東漢未亡之時，所以東漢賦家及作品，今可考見者，當不止此數。

由這些統計數字，我們已不難看出：東漢雖然缺乏言語侍從這種專業賦家，但賦的作家和作品，卻比言語侍從得意的西漢多得多。東漢朝廷雖然缺乏言語侍從的生存條件，但公卿大臣時有製作，班固、張衡的京都大賦，就傳承了原有特質，不能騁才於朝廷的能文之士，當然不肯埋沒他們的專能，仍用力於體物寫志之作，於是辭賦普及於民間。由於施展的空間不同，服務的讀者不同，不但造成量

的擴充，作品的特質也必然產生變異。因時代不同，環境有別，為迎合時勢需要，辭賦到東漢不論形式或內容都有所不同，是可以理解的。

三 從西漢專業賦家地位看西漢賦的特色

在西漢之世，不論言語侍從或公卿大臣，作賦為的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³⁸，是以帝王為作品主要的讀者，以朝廷為作品流通的場所，於是形成以下的特色：

1. 呈現口誦的特色

《漢書·藝文志》說：「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所以賦雖非口傳的文學，但它的表現卻是採用口誦的方式。換句話說：賦雖是書面寫作而成，欣賞者卻是用聽覺來領受。至少在西漢的帝室侯門是如此。《漢書·王褒傳》說王褒到太子宫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太子病癒後，「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即可知其端倪。

由於西漢的賦篇奏獻於朝廷，不以目讀而以口誦，所以賦中大量採用基於口語別義需要而衍生的複音詞；為增強口誦的音樂效果，大量使用雙聲或疊韻的聯縣詞；為使口語傳誦生動，不免挖空心思